

娇千金们

文/梁冰

我的母亲和姨娘出生在安徽宣城的书香人家。姨娘嫁给了扬州富商,生有两个女儿,姐姐叫玉琳,妹妹叫玉琴,都长得很漂亮,也都很娇气,很犟。

姨夫非常富有,住宅有高大的门楼,厚重的黑漆大门,布满盆花的天井和宽敞明亮的厅堂,所有的厢房都挂着绣花门帘,两位千金的闺房还放有风琴、古筝和箫笛。

每次母亲带我去她们家做客,姨娘和“长在深闺”的表妹都特别高兴。进餐时,我注意到两位千金的饭碗都特别小,碗里只能象征性地盛一点点饭,旁边还放着两把景德镇的小茶壶。她们俩用餐时,不是端着饭碗,而是用兰花指轻轻地“勾”住碗沿。她们很少吃菜,只吃一点布在小碟子里的扬州酱菜,并且用小茶壶里专为她俩沏好的浓茶泡饭。

她们家有一台颇为稀罕的甘蔗机,饭后用它榨甘蔗汁,又好喝、又好玩。在姨夫家我还可以喝到进口的瓶装“沙士汽水”和桔子水,喝到罐装的鹰牌炼乳。逢到姨夫、姨娘邀请我们母子星期日到他们家吃早茶,富春茶社把我爱吃的千层油糕、三丁包子、翡翠烧卖和盛在一种可以保温的“锡托子”里的“烫干丝”送到他们家里。两位千金每每把油糕里很好吃的猪油丁挑出来扔在一边,翡翠烧卖只吃馅儿不吃皮。

姨夫家的后花园里除了各种好看的盆景、果树、花木、假山和金鱼塘,还有秋千架。表妹们一进后花园就跳上了秋千。玉琳胆子小,荡得很文雅;玉琴性格开朗、活泼,可以把秋千荡得高过围墙,惊险万状。大家叫她荡得低一点,她越发犟起来,荡得越来越高,在大家的惊呼声中开心得咯咯笑。

“七七”抗日战争爆发,我随姑妈去

了大西北,告别了姨夫、姨娘,也告别了两位难忘的千金表妹。

我和姑妈去大西南,是从南京乘的“澄平”号轮船,先到武汉,再转长沙。同行的是姑妈的好友林阿姨。林阿姨有两个双胞胎女儿,姐姐叫凤英,妹妹叫凤仙,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。

凤英、凤仙的父亲是政界要人,位高权重,我们两家抵达长沙后,暂时同住在一起。我和凤英、凤仙都借读在长沙最著名的幼小小学,我读五年级,她俩读四年级。湖南话不好懂,数学课的加减乘除,“减”字读作“敢”,“乘”字读作“怎”,“除”字读作“渠”。老师课堂提问,她俩答非所问,被老师批评后夺门而出,闯进我正在上课的教室,大喊:“梁哥,老师欺负我们,你管不管啊?”弄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,正在讲课的老师也啼笑皆非。

双胞胎有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姐姐叫凤秋,凤秋已经是个在恋爱的大姑娘了。她每次出去与男朋友约会,总要精心打扮一番,而且对我们这些“小不点”毫不避讳。有次她对着穿衣镜聚精会神地抹口红、戴耳环,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存在,直到调皮的凤仙说:“姐,你打扮了给谁看呀?”才把她吓了一跳。

凤秋大姐也很犟。林阿姨不满意她爱上的男朋友,嫌人家不够门当户对,凤秋丝毫不为所动,照样精心打扮了出去与男朋友约会,而且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。林阿姨无可奈何地直叹气,说:“从小惯坏了!”

后来,日寇对长沙狂轰滥炸,我们两家合租了一辆长途汽车去贵阳。抵达贵阳后,姑妈另租了一处住宅,我与林阿姨家三姐妹渐渐减少了往来。听说,她们长大后都很有成就,凤秋大姐成了作家,二姐凤英成了高级工程师,凤仙小妹则成了舞蹈家。■



相伴月为客
画/潘小庆

魂牵鹅湖山

文/贺景文

“鹅湖山下稻粱肥,豚栅鸡栖半掩扉。桑柘影斜春社散,家家扶得醉人归。”这是一首广为人知的唐诗。鹅湖书院因朱熹来讲过学而遐迩闻名。鹅湖山坐落在江西铅山县境内,像一只鹰雄踞于赣东大地,鸟喙般的山尖直指苍穹。

童年记忆中的小城,城池完好。最繁华的是北门一带,商铺鳞次栉比,古老的北门桥横跨河流之上,桥当中有座四角翘起的亭子。传说南宋的大文人辛弃疾和朱熹都在亭子里歇过脚。辛弃疾的墓就在铅山境内。北门桥下是游泳的好地方,大人小孩都爱爬上鸡公墩跳水扎猛子。河水清澈见底,鹅卵石粒粒可数,鹅湖山的倒影在水中荡漾。

小城虽不大,也有街弄几十条。院落旁边都有菜园,墙上爬满了丝瓜、扁豆、牵牛花。园里的枇杷、竹子、樟树……遮蔽了窄弄上空。因无路灯,夜阑人静月黑风高,便让人平添几分恐惧,传说黑无常白无常总是若隐若现。小孩子们躲猫猫哪里黑往哪里钻。山区蛇多,墙洞里常挂着长长的蛇皮,却鲜有人被蛇咬过。

不知从何时,古人筑石渠引西门外的山泉入城内。水渠流经大街小巷,出水门洞汇入北门桥下。居民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:早晨淘米洗菜,中午洗衣浆衫,傍晚刷马桶浇菜园,决不会有人彼此规矩。小城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庙宇,各家堂屋供奉着“天地君亲师”牌位,人们相信善恶有报,一举一动老天看着呢。

我记得土改时东门外城隍庙里已没有了菩萨,改搭成了戏台。福建来的吊吊戏、上饶来的赣剧……每逢元宵

节,更是小城狂欢日。滚龙灯、舞狮、踩高跷自不必说,最有趣的是蚌壳精。身穿彩绸衣裤的美女躲在两扇竹篾编的大蚌壳内,在竹笛伴奏声中一张一合,翩翩起舞;一个戴长假须的后生腰挂鱼篓,弯腰拣拾田螺。二人配合默契,蚌壳精一会夹住了捡田螺的,一会儿又被他挣脱了,引来阵阵欢笑。我记得吹竹笛伴奏的,人们喊他“馐鸡佬”。他靠馐鸡为生,身上斜跨个布包,吹着短笛走街串弄,我家的大花公鸡就是他馐的,馐过的公鸡肉肥……

我和鹅湖山已睽违了半个多世纪,鬓毛早衰,可乡愁却日盛一日。一个初冬的日子,我终于回到了鹅湖山下。鹅湖山苍翠依旧,儿时记忆中的画面大多被抹去了。墙垣无影无踪,菜园子已见缝插针盖满了房子。拓宽的大街车水马龙,弄堂里也尽是摩托车。

我找到了母校永平小学。平房教室已变成了几栋楼房。校门一侧明代建筑文昌阁,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茕茕孑立,旁边十几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合围的大樟树,依然枝繁叶茂,树上挂满了祈福的红布条。

我逛至北门桥,昔日临河的一排吊脚楼呢?河水已退至很远处。当年熟悉的杂货铺、香烛铺、中药铺,竟都变成了棺材店。我摇摇头,见桥头有人叫卖麻子粿。麻子粿用熟糯米舂好捏成汤圆大小,裹以芝麻糖屑,形似出天花人的麻脸,故名。品尝了这个久违的当地名小吃,心情稍稍好了些。

“毛仔,在外头嚇得来归呦——”“细妹,在外头嚇得来归呦——”暮色苍茫,不绝于耳的喊魂声让我穿越半个世纪前……■

父亲的嗜好

文/金奎

母亲曾笑说父亲“总算缺一门”,意思是常人世俗的三大嗜好烟酒茶中,父亲占了两门:茶与烟。

先说通常被认为是“良性嗜好”的茶。

父亲有着逾八十年的“茶龄”。他生长于名茶“六安瓜片”的产地皖西,祖父和伯父一直做茶麻生意,家里是不会缺茶的。即便是他在北平求学,由于战乱与经济凋敝,偶尔会面临“断炊”之虞,但茶却从未“断”过。

说到喝茶,自然会想到周作人先生说的: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,清泉绿茶,用素雅的陶瓷茶具,同二三人共饮,得半日之闲,可抵十年的尘梦”,这自然是喝茶的至高境界。证之以父亲一生的饮茶行为,倒也部分地应和了作人先生所规定的典型环境、典型器具和典型操作。

首先是茶叶。他一生只喝绿茶,与作人先生“喝茶以绿茶为正宗”的高见不谋而合。他认为嗜花茶的北方人不懂茶:上等茶叶怎么会拿去“窨花”做花茶——言下之意即“花茶”的“茶胚”只能是次等茶叶;也嘲笑嗜红茶的英国人——上等茶叶怎么会发酵做红茶。所以,即便是蒙冤身陷缙绅,之后又交由街道管制的十多年间,潦倒到只能喝一角钱一大包的茶叶末的时候,也强调要绿茶末。而在勉强有支付能力的时候,还是倾心于瓜片——他从小一路喝过来的绿茶。不过到了晚年,他开始喜欢江苏的茶叶了,并逐渐取瓜片而

代之。这是在我来南京工作和定居之后,时常会带一些苏南的地产茶叶,诸如洞庭碧螺春、宜兴雪芽、金坛雀舌等请他品尝。他称赞江苏的茶叶制作精细,汤色清凉,口感香醇,而他买的瓜片做工和口味似乎越来越差。

其次是泡茶用水。“清泉”自然是可望不可即的:家乡的自来水或桶装水的水源地都是淮河。但他同样要求泡茶的“水要好”——其实他所谓的“好水”就是自己用电水壶或液化气烧水。而且他从不说是“烧水”,而是沿用皖西方言称之为“炖水”:把壶中水提升到了美食或高汤的地位。尽管各类传媒时常介绍科学、健康的泡茶、饮茶的知识,他也听,也看,但依然坚持他的不科学也不健康的沸水泡茶、饮烫口茶的习惯。二十余年前他和母亲与另一位也嗜茶的老友结伴去杭州旅游,千挑万选入住一家极小的旅馆。母亲以为是为取其离西湖较近,其实是两位老茶客看中了小旅馆门房里有一只蜂窝煤炉,可以随时供应滚开水。

第三是茶具。素雅未必,但一直用陶瓷茶杯;偶尔用玻璃的,但绝不用不锈钢的保温杯之类——他认为会把茶叶“煮坏”。父亲成为资深老教师后,享有可以端着茶杯进教室的特权。同事中有一位他教过的学生,比他小不了几岁,但一直执弟子之礼甚恭。那位老师也嗜茶,但从不敢

像他那样把茶杯放到讲台上,而是置于教室外的窗台上,课间休息时过去“抿一口”。如果他们在校园里同行,则父亲的那只大号陶瓷茶杯一定捧在他的那位老学生的手上。一位老教师手捧茶杯恭而敬之地尾随着另一位更老的老教师,那图景,真是有些“古老的诗意”呢。

父亲体弱多病,六十岁时做过癌症手术,其间还蒙受不白之冤,坐牢加“群众专政”二十年,居然活到了九十岁,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吧。对茶的嗜好使得他屏蔽了所有的营养保健品:不信,更不吃。他的保健哲学是,茶中自有百味药。他和我的另一位朋友很谈得来——那是一位“发烧级”的茶友,每到一地必访茶,必购茶,时常自豪地宣称:我们喝茶的人是不会得癌症的。以后在我父亲面前,他又将这句话完善为:得了癌症也能很快治愈——这倒也是真的:嗜茶的父亲癌症手术后又活了三十年。他们共同总结的长寿良方倒也简单易行:坚持喝茶不动摇;年年喝,月月喝,天天喝,从早喝到晚。■